

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吴育群 单继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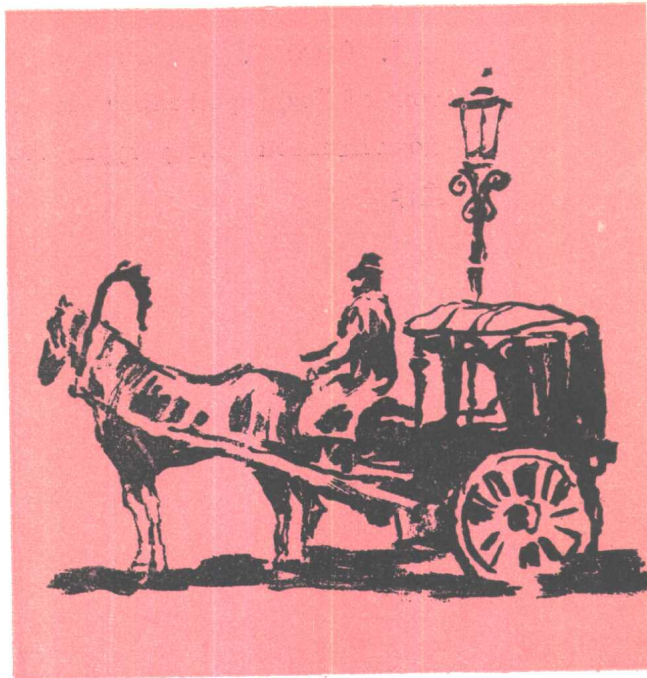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000335

1312.4

138



吴育群 单继达 译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女子学院 0056128

化城出版社

封面扉页设计 谢顺景

责任编辑 黄伟经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

吴育群 单继达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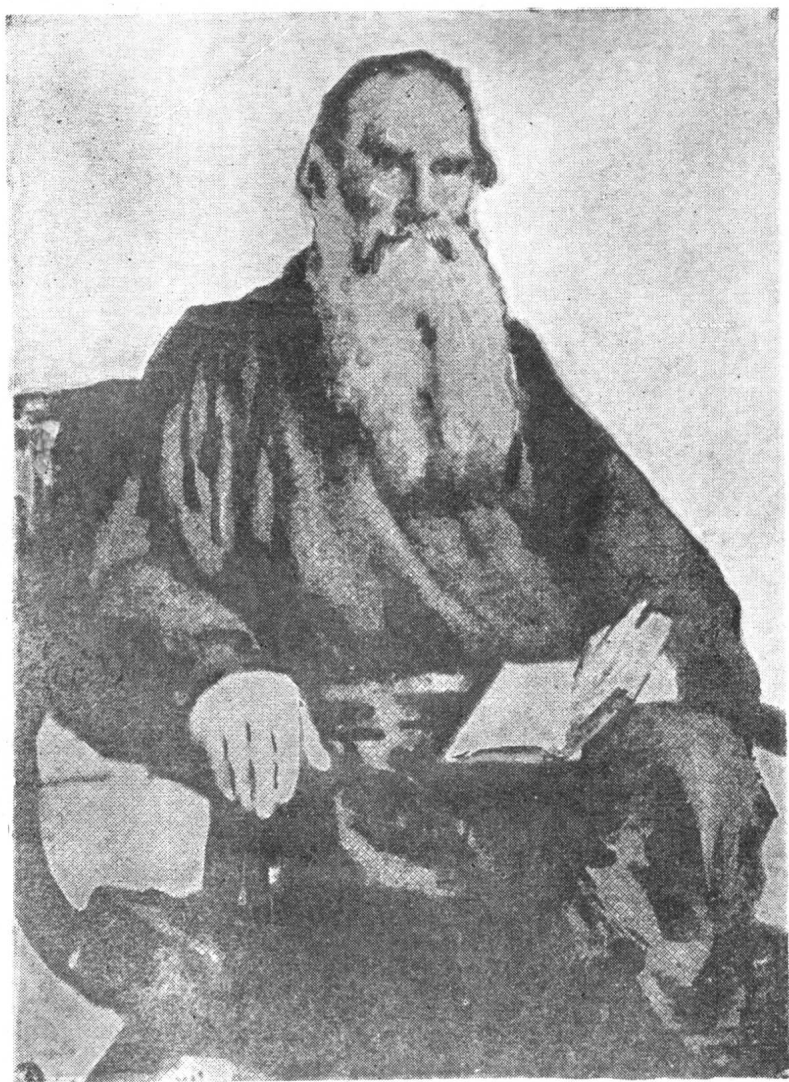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2插页 350,000字

193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0册

书号 10261·269 定价 1.70元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年)

译者前言

托尔斯泰是具有世界声誉和世界意义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之所以具有世界声誉和世界意义，不仅因为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而且因为他的创作和思想观点表现了俄国第一次革命即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主要是一八六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时代。他的创作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整整半个世纪的俄国社会生活。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掠夺性的“农民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但农奴制的残余依然广泛而严重地存在，农民依然呻吟在贵族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另一方面，农奴制废除后，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资本的势力迅速而广泛地侵入广大农村，破坏了农村宗法制生活的基础。农村没有摆脱老的剥削者——贵族地主，又增加了新的吸血鬼——资产阶级。“几百年来的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几十年的改革以后的加速破产，积累了无数的仇恨、怨毒和拚命的决心。于是发生一种倾向，想彻底扫除官办的教会、地主及地主政府，消除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切旧形式和旧秩序，清除地面，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的阶级国家。”^①托尔斯泰对专制制度、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官方教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正是表现了广大宗法制农

^① 《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页。

民的愤怒情绪。另一方面，广大农民还是没有觉悟的，他们习惯以宗法制、宗教、道德的观点来观察问题。托尔斯泰学说中的“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鼓吹宗教、不问政治，正是广大宗法制农民的懦怯、软弱、不成熟的反映。托尔斯泰的思想观点既表现了农民的革命要求，也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从而反映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因此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农民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决定了托尔斯泰学说和创作中的矛盾。列宁准确地总结了这些矛盾：“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等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对社会的欺诈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疲惫的、歇斯底里的、哭哭啼啼的人，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他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坏极了，我龌龊极了，可是我在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了。’一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揭示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与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是何等地深刻；另一方面，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混蛋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①列宁的总结给了我们一把理解这

^① 《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12页。

位伟大作家的创作的钥匙。我们正是应该从这些矛盾来看托尔斯泰的创作。

托尔斯泰的这些矛盾充分而全面地反映在他的三大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中。每一部中短篇小说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中短篇小说除了本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外，还与三大巨著有着思想艺术的联系。例如，中短篇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形象与三大作品的主要人物有着渊源的关系。《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涅赫留多夫，《哥萨克》中的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鲍尔康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一脉相承的，都表现了作家一个时期的思想探索。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家自己的思想探索过程。要了解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世界观及其演变过程，中短篇小说是不可缺少的。本选集所收的中短篇小说都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较重要的作品。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有些较长的中篇没有收入。

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生于莫斯科以南二百公里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贵族庄园里。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失父，由他的姑母照应长大。一八四一年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喀山。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第二年转入法律系。在大学三年级，他申请退学，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决心改善农民的生活，亲自管理田庄事务，同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准备大学学位考试。在这期间他为农民子弟开办学校，在图拉省公署任职，去彼得堡参加大学学位考试。从这些五光十色的活动可以看出，年青的托尔斯泰在

进行生活道路的探索。一八五一年他突然和高加索部队中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一起去高加索，参加了平定山民的战斗。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了两年半，因表现优异，被提升为准尉，后来被调到塞瓦斯托波尔，任炮兵连长，积极参加了抗击土耳其和英法联军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在高加索，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他写了自传三部曲的《童年》、《袭击》、《伐木》等作品，随后又写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初登文坛，便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

一八五五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托尔斯泰从军队中退伍，来到彼得堡。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落后，引起农民运动的高涨。沙皇尼古拉二世意识到，农民革命是现实的危险，与其让革命的烈火自下而上燃烧起来，不如自上而下实行改革。他不得不答应进行“农民改革”。在改革的方式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彻底解放农奴。自由派则奴颜婢膝地支持沙皇政权实行虚假的“改革”。斗争扩展到文学界。在这一斗争中托尔斯泰是站在自由派一边的。

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广泛地接触了农民，深入了解了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写成了《一个地主的早晨》。贵族青年涅赫留多夫为了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在大学三年级申请退学，回到自己的庄园。但他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绪。农民对地主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们不愿接受老爷的帮助。涅赫留多夫建议农民丘里斯放弃半倒塌的破房子，搬进新盖的砖房去，丘里斯带着讽刺的神情说：“房子不赖！就好象是牢房。”涅

000335

赫留多夫的奶妈说得更露骨：“老爷的农民怎么能亮出自己的钱财呢，少爷！万一出个什么纰漏，所有的钱就完了！他和客栈老板合伙经营，……白白丢了一笔钱；跟地主老爷合伙就更靠不住了，一切都会完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托尔斯泰善于深入农民的心灵，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成就。

托尔斯泰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以农民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刻画了一系列普通农民的形象。其中最鲜明的形象是丘里斯。他过着赤贫的生活，但仍保持着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周围一切表现出略带嘲笑的淡漠神情”。涅赫留多夫的理想农民是杜特洛夫老头。“他心爱的理想活生生地浮现在他眼前。他看到他所有的农民都象杜特洛夫老头那样富裕，敦厚，大伙儿都亲切地、高高兴兴地向他微笑，因为他们能过富裕和幸福的生活都得感谢他一人。”他不理解，杜特洛夫是“刚刚在安排下来的”新秩序——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农村阶级分化的结果。

不难发现，涅赫留多夫的形象就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写照。他真心实意地要帮助农民改善生活，但他仍牢牢地站在地主立场上，不肯放弃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进行一些慈善事业，而农民需要的是自由和土地，因此这种慈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涅赫留多夫羡慕伊柳什卡的生活，幻想成为伊柳什卡那样的人，认为伊柳什卡是一个自然的、纯真的、道德尚未败坏的人的榜样。托尔斯泰的平民化思想在这里就已初见端倪了。

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旅游了德国、瑞士和法国。在瑞士卢塞恩，他亲眼目击了一件使他十分愤慨的事情：一个民间歌手在瑞士饭店前面演唱，给那些脑满肠肥、踌躇满志的英

国绅士们以极大的美的享受，但这些阔绰的绅士竟没有一人给他一个铜子。民间艺人得到的不是尊敬，而是冷酷的嘲笑。托尔斯泰义愤填膺，以这件事为基础，写了短篇小说《卢塞恩》。

小说一开头，作家以对比的笔法描绘了卢塞恩的景色，高山湖的湖光山色绚丽多采，美不胜收。大自然是美的，但人为的作品——笔直的堤岸、排列成行的菩提树和长凳却显得很不协调，“破坏美的和谐”。小说的开篇预示了人间关系的丑恶，人和自然的矛盾。这种对比的笔法后来成为托尔斯泰惯用的手法。不难发现，《卢塞恩》的开篇和著名的《复活》的开篇是颇为相似的。

托尔斯泰猛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自由和平等。他愤怒地斥责：“你们冷酷、残忍和可耻”，“你们偷窃了他给予你们的享受”，“你们的共和国坏透了！”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带有虚无主义的性质，他不理解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农奴制度的相对进步性。他认为是非善恶是人们无法判断的。“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只不过是“想象的知识”。只有“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世界精神”能主宰世界。“仁慈而睿智”的上帝安排的人间世界是无限和谐的，人们不能也不应该摆脱他的法则，他的意图。后来形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观点这时已显露端绪了。

六十年代初，托尔斯泰想写一组关于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但只写完了《波利库什卡》。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贫困，农村的阶级分化，老爷的专横，农民的悲惨命运。农民们都知道，派谁去当兵是老爷一个人的意志，村社大会的讨论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小说的中心人物波利库什卡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非人的生活使他沦为酒鬼，窃贼，只是由于女主人的“仁慈”，才被

豁免了兵役。女主人的教诲、开导使他痛改前非。作者认为，女主人的“人道”可以使一个败坏的奴隶获得道德上的新生，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女主人差波利库什卡到城里去取一笔款子。他对女主人的信任感到自豪，他的人格觉醒了。他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坏，他能够和别人一样诚实：“我什么都能做”，“我什么都能做到”。另一方面，他又对女主人表现了奴性的忠诚。正是这种奴性的忠诚导致他的悲剧结局。发现钱丢失后，他觉得无法表明自己的心迹，对不起女主人的信任，只好悬梁自尽。

在这篇小说中托尔斯泰第一次提出了金钱万恶的主题。在他看来，金钱是“恶魔”，波利库什卡悬梁自尽，他的婴儿的惨死，妻子阿库莉娜的发病，都是万恶的金钱造成的。富农杜特洛夫舍不得钱买壮丁，不惜让亲侄子去当兵。捡到了波利库什卡丢失的钱以后，他的良心觉醒了：“钱这个东西真造孽啊！”他用这笔钱买了一个壮丁，赎回了侄子，但那个“自愿当兵”的人却声嘶力竭地大骂：“魔鬼，吃人的魔鬼！”托尔斯泰不了解金钱是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因此他找不到抗拒金钱势力的有效途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了，转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列宁写道：“农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之猛烈的破裂，加强了他的注意力，加深了他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一个转变。就出身和教育来讲，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高等地主贵族，但是他与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的观点决裂了，而且在他的后期作品里，他以剧烈的批判攻击了现代的各种国家的、教会

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①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激变后，他作品中的揭露更深刻了，批判更有力了，这也表现在他八十年代写的中短篇小说《霍尔斯特梅尔》、《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中。

《霍尔斯特梅尔》写于一八六三年，一八八五年作了重大修改。小说的主旨是揭露私有制。一八六三年的稿本只是表明，私有制是不自然的，是令人奇怪的，一八八五年的定稿则表现了私有制的残酷和罪恶。小说的主要部分是马的自述，作者通过马的眼光来看私有制。霍尔斯特梅尔又老又丑，任人欺凌，谁也不再需要它。在这凄凉的晚年它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它原是一匹出色的骏马，私有制使它落到各种各样的主人手里。因为它是人们的私有财产，人们可以任意奴役它，鞭打它。它不能明白，为什么把它和各种东西称为“我的”，为什么“我的”东西越多，人们就越幸福。人们不是力求多做好事，而是力求把更多的东西称为“我的”。人们说“这马是我的”，可是并不骑它，说“这房子是我的”，可是并不住这所房子，说妻子是“我的”，可是妻子和别人同居。它认为：“在生物的阶梯上，我们（马）比人类站得更高。”骠骑兵军官谢尔普霍夫斯基占有了它，有一次为了追赶自己的情妇，把它折磨成残废。

霍尔斯特梅尔的一生和谢尔普霍夫斯基公爵的一生成为尖锐的对照。前者是劳动、为人们服务、有益于人们的一生，后者的一生则只是追逐女人，寻欢作乐，挥霍了二百万家财，还债台高筑。他没有做过任何好事，却祸害了许多人。霍尔斯特梅尔死

① 《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4、25页。

后，它的皮、肉、骨头都派了用场，而谢尔普霍夫斯基的皮、肉、骨头毫无用处，他被埋葬入土也只是人们的多余的麻烦。

《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一个官吏的一生揭露了整个官僚世界。伊凡·伊里奇是一个法官，还在法学院读书时，他就“象苍蝇喜欢光亮一样，竭力结交上流社会的高官显贵，学习他们待人接物的处世态度和他们的生活观点，并同他们建立友谊的关系”。起初，他干一些卑鄙龌龊的事情时，曾引起他对自己的厌恶情绪，但是他看到高官显贵们也干这种事情，而且不认为是坏事，他也就心安理得了。法学院毕业后，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寻欢作乐，巴结上司，滥用权力，但一切都做得体面，得体。他结婚不是因为他爱未婚妻，而是因为这是上司认为是正确的事。没有爱情的婚姻自然只能引起不断的争吵、冲突，于是他要求家庭生活仅仅“保持社会舆论规定的表面形式的体面”。正在他年富力强之时，他患了癌症。使病人难以忍受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痛苦。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童年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他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是虚伪的，丑恶的，一切都是“不对头的”，他以前所过的“不是应当如此的”生活。而他周围的人仍在不断地说谎，只有侍候他的仆人格拉西姆一人不说谎。他喜欢并羡慕这个年青、健康、永远快乐的农民。托尔斯泰在这里再次表现了他的平民化思想。小说中一再强调，伊凡·伊里奇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的同僚也都和伊凡·伊里奇一样利欲熏心，冷酷无情，虚伪欺骗。他们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时不是感到悲伤和同情，而是首先想到自己的升迁，这就突出了伊凡·伊里奇的典型性。

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矛盾：一方面，他深刻地揭露官

像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冷酷虚伪；另一方面，他又表明，统治集团的人必须实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达到道德的新生。作家真实地描写了病人的心理状态。真切的心理描绘，典型化的技巧，使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莫泊桑读了《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后说：“我明白了我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我整整十大卷的作品都一文不值。”

在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又回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尖锐地提出过的婚姻和家庭主题。作家通过主人公波兹德内谢夫表述自己对婚姻和家庭观点。波兹德内谢夫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猛烈地抨击了贵族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就已开始寻花问柳，这在上流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人们满口仁义道德，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男女的结合不是建立在真诚的爱情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肉欲的基础上，买卖的基础上。整个上流社会就是一所大妓院。这样的婚姻势必酿成悲剧，主人公因妒忌而杀死了妻子。

在揭露贵族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的同时，托尔斯泰宣扬了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必须节欲，应该节制生育，“以节制和纯洁来达到善的理想”。托尔斯泰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女人无权不在于她不能投票表决，或者不能当法官，而在于在两性的交往中她不能和男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中”。作者甚至否定了科学、医学和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为医学不是去铲除卖淫制度，而只是医治卖淫制度的后果，而工业生产出来的奢侈品只能刺激人们的性欲。如何解决家庭问题呢？只有实行

道德自我完善，实行节育！

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冬，托尔斯泰参加了赈济灾民的工作，深入了解了农村的生活和农民赤贫的社会原因，创作了短篇小说《业主与雇工》。小说揭示了业主发财致富和雇工贫困破产的真正原因：“尼基塔这样的雇工的工钱应该是八十卢布，但瓦西利·安德列伊奇只给他四十卢布，付工钱时并不计算，是零零星星支付，而且多半不是给现钱，而是按高价给他自己铺子里的货物。”

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农村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托尔斯泰以他惯用的笔法对比了业主和雇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勃列胡诺夫贪婪，残忍，狡猾，不断地欺骗和盘剥尼基塔：“咱们是老老实实。你给我干活，我不会亏待你的。”尼基塔明知主人在欺骗他，但只好忍受，因为“总得生活，暂时无处可去，给多少就拿多少吧”。尼基塔“干活勤快，机灵，有力气，主要是他性情善良，讨人喜欢”。在暴风雪迷路的时刻，他比主人表现得更勇敢和机灵，业主反而听命于雇工。

在这篇小说中托尔斯泰照例宣扬了“不以暴力抗恶”和宗教思想。他竭力美化尼基塔的温良顺从。在面临冻死的危险时，尼基塔并不怕死，因为他相信上帝，而上帝是不会委屈他的。“他感到自己在尘世生活中永远是属于使他降生到尘世来的那个主要主人；他知道，即使死后，他也还是在这个主人的掌心里，而这个主人是不会委屈他的”。小说最后，勃列胡诺夫解开皮袄，趴在尼基塔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暖和他。尼基塔得救了，而勃列胡诺夫却冻死了。业主的自我牺牲行动是完全违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是不真实的，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原则。托尔斯泰这样处理小说的结局，是为了证明：每一个人都可能“悟彻”，都能认识上

帝，认识基督的博爱精神。如果人人都具有基督的博爱精神，那么就能消除一切社会矛盾。这种宗教的说教自然不能不削弱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托尔斯泰密切注视着国内的紧张形势。他对革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尖锐地揭露和抨击专制制度，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一切基础，甚至赞成农民的暴力行动；另一方面，他又宣扬“不以暴力抗恶”、“不问政治”。一方面，他同情和尊敬革命者；另一方面，他又不理解革命，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式，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矛盾的态度充分表现在他晚年所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舞会以后》（一九〇五年），《为什么？》（一九〇六年），《神意与人意》（一九〇六年）。

《舞会以后》是根据一件真实事件写成的。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读书时，他的哥哥谢尔盖爱上了当地军事长官的女儿。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尔盖目击了未婚妻的父亲——上校监督执行夹棍刑的惨象。晚会上上校还同他美丽的女儿温文尔雅地跳舞，第二天一早就到操场去监督执行夹棍刑。“罪犯”被押着从两行士兵中间走过，士兵们在鼓声中鞭打“罪犯”的脊背。上校冷酷地监视着。谢尔盖看到上校的残暴后，对他女儿的爱情冷却了。作者通过这一事件揭露了俄国专制制度及其支柱——沙皇军队的残暴。

托尔斯泰以“撕下假面具”的手法暴露了上校的冷酷残暴。小说首先描写舞会的欢快气氛，上校女儿的美丽迷人，上校本人的温文尔雅，然后笔锋一转，描绘惨不忍睹的行刑场面。舞会和刑场形成尖锐的对照，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

小说揭露和批判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是托尔斯泰又隐约地宣扬了“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主人公讲述这一

事件是为了证明“一切全在于机会”，而不是“一切全在于环境，环境能腐蚀人”，也就是说，要铲除“社会的恶”，不需要改变社会环境。主人公目睹了上校的残暴，但没有谴责他，而是原谅他，宽恕他。“既然这事做得如此信心十足，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必要的，那就是说，他们一定是知道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他没有想去“抗恶”，而是洁身自好，不到军队中去服役，不到官府去当差。主人公的这种观点无疑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是写沙皇政府镇压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的故事。一七九五年波兰又一次被瓜分，一八三〇年波兰人民举行起义，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托尔斯泰虽然主张“不以暴力抗恶”，但同情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家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波兰的独立解放战士米古尔斯基的形象。米古尔斯基因参加起义而流放西伯利亚，他从监狱中写来的信中说，“不管他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不管他还要遭受什么苦难，为了祖国而受苦受难他感到高兴，对于他为之献出了部分生命并准备献出全部生命的事业他并没有绝望，如果明天还有可能，他还要这样做。”

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阿莉比娜活泼，天真，热情，乐观。她深深地爱上了米古尔斯基，把他看作为“永远过着崇高和英勇生活的英雄”，“最优秀的人”，“理想的人”。她离别了家乡，不远万里，到荒无人烟的边陲去和心爱的人作伴。阿莉比娜机智勇敢地设法帮助丈夫潜逃，但功败垂成，丈夫将受一千人的夹棍刑。她无可奈何地喊道：“为什么？”对此作者给予了回答，镇压波兰革命的罪魁祸首是沙皇尼古拉·巴夫洛维奇。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和幼稚的虚荣心”，使千千万万的波兰人受尽了苦难。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不仅扼杀了波兰的